

探討翻譯在外語教學上之應用

廖柏森

國立交通大學語言與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要

翻譯與外語教學的關係極為密切，不過不同的外語教學方法對於翻譯所扮演的角色卻有截然不同的看法。雖然有教學法視翻譯為外語教學上重要的練習活動和評量工具，但也有些教學法則對翻譯敬而遠之，以免學生的外語學習受到母語的干擾，產生外語錯誤或降低學習成效。不過學生在外語學習的過程中使用翻譯實是難以避免的心智認知活動，課堂上學生需要翻譯的學習需求常常和教師對於翻譯的負面信念相互抵觸，因此翻譯活動在外語教學上的定位一直未能釐清。本文旨在提出，近年來受到認知學習理論(cognitive-code learning theory)和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等學習理論興起的影響，國內外許多的實證研究報告已指出在外語教學上使用翻譯是種頗具價值的資源和工具，但使用翻譯並非是要重返過去文法翻譯教學法(Grammar-Translation)的老路，而是與目前盛行的溝通式語言教學法(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結合，提昇學生外語的溝通能力。因此本文探討了翻譯在各種外語教學法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翻譯在外語教學中所可能產生正面和負面的效應、以及如何有效地使用翻譯來增進外語教學的成效，俾便外語教師能對翻譯抱持比較客觀持平的態度，進而將翻譯整合至其授課內容，實施多元教學活動，以培植學子多方的語言技能。

關鍵詞： 翻譯、外語教學、溝通式語言教學

前言

過去幾個世紀以來，翻譯與外語教學的關係極為密切。眾所周知，要成為譯者，優異的外語能力是不可或缺的條件；不過要學好外語，使用翻譯是否有助益則是人言言殊，甚至不同的外語教學方法對於翻譯所扮演的角色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有的教學法視翻譯為外語教學上重要的練習活動和評量工具，但也有些教學法對翻譯敬而遠之，甚至禁止學生在課堂上使用母語或翻譯。正如 Malmkjær (1998) 所言：「多數老師在語言教學上使用翻譯一事都會有自己的看法。」然而自廿世紀以降許多的語言教學理論和實務教學活動都傾向於在課堂上避免使用翻譯，以免學生的外語學習受到母語的干擾，產生外語錯誤或降低學習成效。

舉例而言，廿世紀初盛行的文法翻譯法(Grammar-Translation Method) 中，翻譯是很重要的寫作練習，用以確保學生對外文理解的正確性(accuracy)。但其後發展出來的直接教學法(Direct Method)和六十年代的視聽教學法(Audio-Lingual Method)就將翻譯排除在課堂教學活動之外，直至目前最廣為施行的溝通式語言教學法(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也鼓勵教師在教學上只使用外語來從事真實性和功能性的溝通活動，重視學生外語的流暢性(fluency)，翻譯在此種教學法上沒有特別地位。許多外語老師仍認為學習外語最佳的方式就是直接用外語來思考，而無須再經過由母語轉化成外語的翻譯過程。

但如 Zohrevandi(1992)指出，如果學生在練習外語時急需知道某些字的意義，而外語教師卻只是執意拒絕他們使用翻譯或母語，那學生在受挫之餘可能會對外語或對教學法產生負面的感受，甚至因而學習成就低落。而事實上，近年來因為認知學習理論(cognitive-code learning theory)和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等學習理論的興起，愈來愈多的研究也重新評估翻譯在外語教學上的角色，證實翻譯在外語教學上也能有許多正面的貢獻，並提高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的成效。可惜翻譯活動在外語教學上的定位一直未能釐清，因此本文旨在探討翻譯在各種外語教學法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翻譯在外語教學中所可能產生正面和負面的效應、以及如何有效地使用翻譯來增進外語教學的成效，俾便外語教師能對翻譯抱持比較客觀持平的態度，進而將翻譯整合至其授課內容，實施多元教學活動，以培植學子多方的語言技能。

一. 翻譯在各種外語教學方法上的角色

(1) 文法翻譯法

利用翻譯來學習外語可以回溯到羅馬帝國時期，而在歐洲中世紀時已相當盛行。原本古典的拉丁文是行政、教育、貿易、和宗教各領域的主要使用語言，到了十六世紀因為政治體制的改變，英文、法文、義大利文等地方語文逐漸受到重視而普遍使用，拉丁文的學習遂轉化成為學校課程的一部份，用以增進學生的心智和人格修養，以及研讀拉丁文典籍的能力。當時學習拉丁文最基本的方法就是

背誦單字、修習文法、和翻譯的寫作練習，口語能力的訓練則付之闕如。直到十九世紀，此種方式已經成爲一種標準的外語教學方法，並被稱之爲文法翻譯法(Howatt, 1984)。

可是對許多外語學習者而言，文法翻譯法中卻是充斥無趣的文法規則以及嚴肅的文學性翻譯，鮮少顧及到日常生活中所需的用語，Catford(1965)曾直言文法翻譯法最主要的弊病就是教授「不良的文法和不良的翻譯 (bad grammar and bad translation)」，亦即教授隱晦無用的文法規則和翻譯脫離文境的片斷語句，難怪文法翻譯法逐漸沒落。到了 1940 年代，由於國際間的交流溝通日益頻繁，強調外語聽說的能力比起讀寫能力日漸受到重視，而導致直接教學法和聽說教學法的興起。

(2) 直接教學法

直接教學法於廿世紀初於美國興起，當時的語言研究興趣集中在兒童如何學習母語的行爲上，外語教育者有鑑於兒童學習母語的驚人成效，就套用母語的學習模式引爲外語的教學方法。其基本原則就是禁止在課堂上使用翻譯，教師用外語教導日常生活用語以及解釋文法單字，學生只能像學母語般直接瞭解外語的語義和語法，不能經由翻譯的過程來理解。

但是直接教學法無法說明語言具有規則的特性，也難以向學生解釋語言的結構，而禁止使用翻譯的規定也產生反效果，課堂上許多原本可以用翻譯有效率解決問題的情境，但教師必須浪費寶貴時間和精神使用外語講解，而學生卻仍一頭霧水、不得其解。尤其這些教學法必須倚重外籍教師或口語能力極佳的本國籍老師，師資來源是一大困難。

(3) 聽說教學法

聽說教學法源起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美國在短期內亟需大量外語人才供作戰所需，而在 1960 年代達到最高峰。它是奠基於當時的結構語言學(structural linguistics)和行爲主義心理學(behaviorist psychology)的學習理論上，認爲語言行爲主要是經由仿效外界的語言刺激所培養成的一套習慣。其特點就是在教學上注入許多句型練習(pattern drills)，要求學生重覆模仿對話的範例，並透過視聽設備，強調發音的正確性，增強(reinforce)學生接觸練習外語的機會，希望讓聽說外語成爲一種自動的反應，無需經過思考。

聽說教學法與直接教學法一樣，認爲母語容易干擾外語學習，因此不鼓勵在教學上使用翻譯，教師只使用外語，期使學生的母語干擾能降至最低程度。然而聽說教學法在編製教科書或教材時，主要仍是以學生的母語和外語間所做的對比分析(contrastive analysis)爲依據，比較兩種語言結構的異同，相同的地方也許可以促進學生的語言轉移(language transfer)，而迥異之處就可能是語言干擾的來源，因此聽說教學法雖然在課堂上施教時不使用翻譯，但翻譯對其教材的編製其實有很大貢獻。

可是聽說教學法的成效並不如預期理想，學生在課堂上重覆所練習的機械性對話在實際生活中根本不敷所需，難以達到溝通的目的。在 70 年代其它的教學技巧也應運而生。

(4) 團體語言學習 (Community Language Learning) 和暗示教學法 (Suggestopedia)

在 1970 年代，翻譯在兩種頗受歡迎的教學法中是佔有重要地位的，那就是團體語言學習和暗示教學法。團體語言學習體認到在外語學習時心理和情意層面的重要性，希望能消弭學習環境帶給個人的焦慮、競爭、和衝突。許多學生在純粹外語的學習環境中常感到不安並遭受挫敗，甚至退縮而放棄學習；然而在課堂上使用母語可以讓學生在學習上提高信心和安全感，老師可以幫學生翻譯他們不懂的詞彙，讓學生重覆練習，善用學習潛力，漸次培養出直接說外語的能力。因此團體語言學習是藉由翻譯來降低學生在學習外語上的負面情緒，能夠安心上課。

暗示教學法則更強調學習外語時應保持輕鬆心態，主張可以使用大量的母語和翻譯，消除學生上外語課的恐懼感，進而建立自信心。最常用的教學技巧就是在舒適的課堂環境中，播放輕柔的背景音樂，老師使用本國語和外語對譯的教材，讓學生能容易理解教材內容的意義，並在需要時可以用母語來講解，讓外語學習成為快樂的經驗。換言之，團體語言學習和暗示教學法都是主張翻譯能幫助學習者利用母語的知識來克服學習外語的心理障礙，並減輕他們的學習焦慮 (learning anxiety)。

(5) 默示教學法 (Silent Way)和肢體動作回應法(Total Physical Response)

1970 年代也有幾種教學法忽視翻譯在外語教學上的功能，例如默示教學法和肢體動作回應法都認為學生在學習上應該盡可能直接用外語思考，尤其是在初學的階段更應避免使用翻譯。

默示教學法使用特製的木棒和掛圖來引導學生學習外語，老師將單字寫在圖表上，用不同顏色的木棒代表不同的句型和結構，至於意義的掌握主要是靠學生自己的覺察和推理能力，而非依賴翻譯。而在肢體動作回應法上，外語是透過肢體的活動來學習，學生必須注意傾聽老師的外語口頭指令，再以肢體反應出動作，很少有用到母語的機會。在上述的兩種教學法裡，教師都是有意阻止學生使用母語，因此翻譯也被視為不利於外語的學習。

(6) 溝通式語言教學法

由 1970 年代迄今，溝通式語言教學法蔚為外語教學主流，該教學法的目的是培養學生用外語溝通表達的能力，能在不同的社會情境下適切地使用外語。老師常使用實物 (authentic materials) 透過角色扮演(role-playing) 和解決問題 (problem-solving) 等溝通性教學活動來達到學習目標。老師在教學活動中通常只

使用外語，學生的母語翻譯在此教學法中並未佔有任何地位，。

然而溝通式教學法也不是萬靈丹，由於它偏重於口語技巧的訓練，較適合學習第二語言(second language)的學生，可是對於學習外語(foreign language)的學生而言，可能閱讀和寫作的需求更加重要，溝通式教學法對此就較缺乏著力處。而且在外語學習的情境中不使用翻譯同樣會引發某些問題，Swan (1985a, 1985b)就提出嚴詞批評，認為溝通式教學法完全忽略學生所具有的母語技能和背景知識。畢竟學生在學習階段，外語能力仍屬有限，教師一味要求學生在課堂上只能用外語去做角色扮演或小組討論，不但浪費時間，而且學生常常只是一知半解，並且被迫只用外語表達反而會與他人溝通不良而備受挫折。因此 Swan 和 Walter(1984)提出「後溝通式教學法(post-communicative)」的觀念，以認知學習理論的觀點強調母語並非學習外語的障礙，反而是學習上的一種可貴資源，學生能以他們學習母語的經驗和知識為基礎，發展使用外語溝通的知識和技巧。

二. 翻譯在外語教學中的效應

(1) 翻譯在外語教學上的負面效應

廿世紀之交，所謂外語教學的「改革運動」(Reform Movement)開始對文法翻譯法發難，批評它忽視口語技能、教導片斷零碎的句子、鼓勵母語和外語間錯誤的對應 (Howatt, 1984)，之後才有直接教學法取而代之。廿世紀中葉之後，因為文法翻譯法在外語教學上迭次遭致學界攻伐，翻譯活動本身也遭池魚之殃而污名化，許多學者或外語教師都反對或誤解翻譯在外語學習上的效能 (Bloomfield, 1961; Hartmann and Stork, 1964; Lado, 1964; Huebener, 1965; Gatenby, 1967)。如 Bloomfield (1961) 就批判：「翻譯註定會誤導學習者，不但因為不同語言間的意義單位是不相符應的，也因為學生在練習時受到母語形式的刺激，幾乎都會遺忘外語的形式。」Hartmann 和 Stork(1964)也指出用翻譯來教外語有個錯誤的基本假設，亦即認為若能在兩種語言間自由出入就會自動提高理解和使用外語的能力，如此一來把翻譯僅視為一種語言輸入和產出的固定模式(input-output routine)，容易造成字面翻譯(literal translation)，而且學生為了懂得字義動輒必須翻查字典，學習外語的興趣很快就被扼殺，所以他們結論出翻譯的教學應該只限用於訓練譯者。Danchev (1983)、 Malmkjær (1998)和 Newson (1998)曾經總結外語教師反對使用翻譯的立場如下：

1. 翻譯使學生不願用外語思考，延遲其流利度和創造性語言的習得過程。
2. 翻譯誤導學生以為兩種語言間呈顯簡單的字對字之對應關係。
3. 翻譯剝奪老師和學生可以只使用外語上課的寶貴時間和機會。
4. 翻譯會產生語言干擾。
5. 翻譯是獨立於說聽讀寫四種語言技能之外的技能，僅適合用來訓練專業譯者。
6. 翻譯是種不自然的語言，而且不適合當作外語測驗的題目。

從以上這些批評可見翻譯在外語教學上時常為主流的教學法所忽視或甚而

話病，尤其一旦和文法翻譯法結合後，學生容易流於背誦記憶孤立的單字翻譯，並用以在句子上從事生硬的逐字翻譯，導致句意不清或理解錯誤。證諸以往經驗，在外語教學上不當地的使用翻譯確實為師生帶來許多困擾，難怪有人望而卻步，提倡直接用外語教學，鼓勵學生跳過用母語思考的認知階段。

(2) 翻譯在外語教學上的正面效應

但是從學習者的觀點來看，翻譯本是外語學習過程中難以避免的一種認知活動，翻譯不但可以幫助學生理解、記憶、和使用外語，也可降低他們的外語學習焦慮和挫折感，所以事實上學生使用翻譯當作一種學習策略(learning strategy)來學習外語的情況非常普遍 (Naiman et al., 1978; Marti Viano & Orquin, 1982; Politzer, 1983; O'Malley et al. 1985; Chamot et al. 1987; Liao, 2002)。例如 Naiman et al. (1978)在從事所謂「優秀語言學習者(Good Language Learners)」的研究時發現，這些成功的學習者常用的學習策略之一就是審慎地將外語翻譯成母語，並有效地比較兩種語言間的異同。而 O'Malley et al.(1985)則是調查英語學習者學習策略的使用頻率，結果在 11 種認知策略中，翻譯的使用就佔了 11.3%，名列第四位，比例相當高。另外 Marti Viano 和 Orquin (1982) 也報告西班牙兒童學習英文字彙時，翻譯是瞭解字義最有效的工具。可見學生使用翻譯學習外語的頻率相當高。

在外語教學上，翻譯也常作為外語練習和測驗的方式，幫助學生釐清語義和認清自己學習上的弱點，還可以體會到兩種語言文化間的差異。所以 Catford(1965)主張翻譯只要使用得宜，而且若老師能瞭解它的本質，翻譯其實是很好的教學技巧。而 Danchev (1983)指出翻譯對於外語教學能有以下的正面貢獻：

1. 母語和外語間自然清楚的比較，有助於學習者解譯困難的外語結構和元素。
2. 快速而有效的理解控制。
3. 可以克服與中和母語轉移之干擾。(p.35)

可見翻譯作為母語和外語轉化間的中介活動，對學習外語而言亦有很大貢獻。再者由於近廿年來認知主義和社會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的興起，外語老師也較能跳脫以往以行為主義視外語學習為習慣養成的窠臼。認知學習理論認為外語學習不是外在語言行為的模仿複製，而是學習者內在心智能力有意識的創造，所以外語教學應該要設計有意義的語言使用情境，鼓勵學生本著語言規則去發揮語言的創造力(Carroll, 1966)。而 Chellappan(1991)指出翻譯正是外語認知的一種基本模式，只要涉及第二語言的習得，就經常會發生從第一語言到第二語言的翻譯，學習者必須重新組織原文的意義，再用譯文表現，其實這是個複雜的認知過程，包括學習者必須先提出假設性(hypotheses)的翻譯、測試這些假設的對錯、再修訂原有的假設，整個解決翻譯問題的工作(a problem-solving task)可以直接增加學生對外語學習的敏感度。

社會建構主義則主張知識的學習不是靠被動的灌輸，而是學習者主動和他人共同建構而成。Vygotsky(1978)提出學習就是引發學習者潛能的歷程，初學者能

獲得知識較豐富者的引導和支持，透過互動而幫助彼此的認知發展。例如在課堂上使用母語和翻譯來完成外語的練習，極大程度是依賴學生和老師彼此間利用他們的背景文化知識及既有的語言技巧共同建構出來的成果，Donato(1984)的研究就描述了美國大學生在上法文課時，程度不同的同學透過翻譯和團體扶助(collective scaffolding)共同學習，過程中每位同學對問題的理解和處理能力不同而都有個別的貢獻，進而促進彼此的學習成效。

如今愈來愈多的外語教育者已逐步接受翻譯究其實是一項相當複雜的認知行為和社會活動，近年來肯定翻譯在外語教學上具正面貢獻的論文和研究更有日增的趨勢，值得外語教師捐棄傳統對翻譯的成見，深入探究在課堂上使用翻譯的可能效益(Baynham, 1983; Titford, 1983; Perkins, 1985; Atkinson, 1987; Tudor, 1987; Chu, 1990; Newmark, 1991; Zohrevandi, 1992; Husain, 1994; Chen 2000)。

三. 翻譯如何增進外語教學成效

(1) 整合翻譯和溝通式教學法

很多外語老師不喜歡在教學中使用翻譯是因為不想重蹈傳統文法翻譯法的覆轍，只是讓學生背單字文法和做翻譯練習，何況文法翻譯法也無助於提昇學生的口語溝通能力。但是翻譯作為一種教學技巧(technique)或活動(activity)並不同於文法翻譯的教學法(method)，其實翻譯也可以應用在其它的教學方法，目前已經有許多學者建議將翻譯整合到溝通式語言教學法中。例如 Tudor (1987)論道：「翻譯傳達跨語言和跨文化的訊息，是種最佳的溝通活動，應該比現行的教學情況更為廣泛使用。」他認為翻譯練習不僅要「以意義為中心(meaning-centered)」，也要「以接收者為中心(receptor-centered)」，所傳達的訊息才能跨越語言和文化的界限。另外 Titford (1985)認為學生在經過基本的溝通性語言的訓練後，翻譯是種最佳的後溝通式活動(post-communicative activities)，可用以鞏固(consolidate)學生之前所學過的語言技能。傳統的翻譯活動中，學生通常是記憶個別的外文單字和對應的翻譯，再以母語去理解外語的文法解釋，而課堂的練習往往是就片段的句子逐字翻譯。然而現在我們若欲將翻譯整合到溝通式語言教學法中，就必須視翻譯為語言溝通的工具，用翻譯來照顧溝通的需求。而且 Husain (1994)也主張在「後溝通式教學法」時代中應該注入像翻譯這種歷久彌新的教學技巧，他提出幾個在溝通性外語教學法中使用翻譯的原則：

1. 學生應該大量接觸外語，而且在教學中可以審慎地使用母語。
2. 教學活動同時注重語言表達的正確性和流暢性。
3. 老師要為翻譯活動提供適切的上下文(context)，不能再像傳統的文法翻譯法般只以單句為翻譯的單位。
4. 以溝通能力為教學目標，聽說讀寫四項技能都不能偏廢。
5. 以歸納法教授文法，有別於文法翻譯法所用的演繹法教學。
6. 翻譯的材料必須實際而且配合時宜，避免使用過時和生硬的教材。

7. 用翻譯來突顯母語和外語間的同異。

足證翻譯和現行最受歡迎的溝通式語言教學並非相互排斥、而是相輔相成的。近來的外語教學理論已將翻譯視為一種實務的溝通技能，而非只是傳統觀念上的逐字直譯，落實在教學上更能配合不同語言技能和教材主題作彈性使用。所以翻譯可以彌補溝通式教學法在語言結構和讀寫技能上教學的不足，而溝通式教學更可協助翻譯在跨越語言文化障礙上扮演更靈活的角色。

(2) 國外外語教學使用翻譯的研究

翻譯並不必然是外語學習的最終目標，但翻譯卻可以是絕佳的外語學習資源和工具，學生可以據以瞭解外語文法、增進字彙、理解篇章、甚至有助於培養聽說技能。例如 Zohrevand(1992)把學生分組，每組都分配幾個母語的單字和片語，學生必須在規定的時間內將這些單字片語翻譯成英文，並據以寫成一篇簡短的英文會話，每組同學都要經過腦力激盪式的討論才能解決語言、語境、和文化差異上的困難點，最後每組都要口頭演示他們的會話，表現最優秀的一組會給予獎勵。Zohrevandi 還建議其它的翻譯活動，包括請學生用錄音機錄下英語會話和母語的翻譯，再請其他同學作語義、語法、和語用上的分析；或讓學生翻譯英文影片或戲劇，之後再請學生用英語演出這部戲；或分組讓學生作逐步口譯練習(acting as consecutive interpreters)。這些整合性的教學活動不但可以增進學生讀寫聽說的溝通性技能，同時也能訓練學生根據語境和語用來找出恰當的翻譯。

Levenston (1985)也認為在溝通式教學法中，翻譯是種有效的教學技巧和語言評量工具，他建議教師可以在課堂上使用口譯來做角色扮演的活動，例如有同學可以扮作外籍觀光客，到了郵局碰到不會說英語的職員時，可以由另一位同學居間擔任口譯的工作；或讓同學扮成外籍人士在車站時不知如何是好，而其他同學就可以英語口譯來幫助這位「外國友人」，達到溝通的目的。這些都是日常可能遇見的自然情境，當然活動也可以再擴充到其它的公共場合如餐廳、機場、或百貨公司等。而英文程度不同的學生也可以根據語言需求和場合功能扮演不同的角色，使每個人都有揮灑多元能力的空間。

至於在翻譯的教材上，Tudor (1987)建議不用再侷限於傳統的文學性翻譯，可以配合語言課程的教學目標和學生的專業需求，舉凡新聞、商業、法律、社會、科技甚至廣告都可作為翻譯的題材，重點是需要多元化和生活化的教材，使同學得以練習翻譯不同專業的實際用語，同時開拓更寬闊的知識領域。

(3) 台灣外語教學使用翻譯的研究

國內的英語教師也曾從事在教學中使用翻譯的實證研究，皆獲致正面的效果。例如 Hsieh (2000)在英文「字彙與閱讀」課中請同學分組將英文文章翻譯成中文，接著以口頭報告方式解釋他們是如何翻譯特定的關鍵字彙和句型結構。期末的問卷調查和學習成就後測(post-test)證實翻譯不但可增進學生的英文閱讀理解能力、閱讀策略、字彙量和文化背景知識，同時也讓同學意識到中文表達的重

要性。

在英語的閱讀和文化教學上，Chan(2000) 認為平行研讀原文和譯文是種有效的教學策略，學生對原文若有理解困難時，閱讀譯文會比翻查字典更有幫助。她建議在教導高階學生時，可以使用中國文學作品的英文翻譯，讓學生能夠學習使用英文來表達他們已經很熟悉的文化概念，學生在讀英文譯本時甚至會發現原先讀中文時所忽略的意義。

另外從中英兩種語言的對比分析出發，Huang (2003)認為使用交叉翻譯(cross-translation)的練習可以加強學生對於英語慣用語(idiomatic English)的認知。Huang 請學生將中英雙語童書的中文翻譯成英文，再把其譯文與書中的原文作比較分析，遇有不同或困難的譯文就劃線標記，如此學生可有意識地注意到其譯文和原文的異同。比較完後再進行小組討論和教師指導，以解決同學翻譯上的疑難和中式英文(Chinglish)的寫作傾向，進而增益其跨語言意識(cross-linguistic awareness)。

而筆者(Liao, 2002)在調查台灣大專生使用翻譯的學習策略時也發現，在英文課堂上的小組討論時，若老師強迫學生只能用英文討論，同學因為英文表達能力不足，顯得非常缺乏信心且沈默寡言；但若老師允許同學同時使用中英文來討論，氣氛頓時熱絡起來，同學如果有英文表達上的困難，其他人也會主動幫忙翻譯，使得意見的交流更為順暢持久，足見翻譯也能增進團體成員間外語溝通的目的。

國內外的研究皆已證明翻譯只要運用得宜，無論是在說、聽、讀、寫、字彙、閱讀、文化教學、專業英語和溝通技能上確實都可以增進外語教學效果，以上所舉國內外課堂上的教學例證也都可作為教師施教的參考。總結言之，翻譯原本就是學習外語的一種自然認知過程，應該可以和其它外語教學法整合，尤其是運用在目前最流行的溝通式教學法中，成為一種有目的和有意義的教學活動，舉凡選用實際的材料如報紙、雜誌、甚至影視節目讓同學翻譯，同學譯完後可以作角色扮演或幫影視節目配上外語發音；或者在教室中設定場所和情境讓同學練習擔任口譯員解決外語溝通問題等，這些活動都能讓學生覺得實用和有趣，當然最重要的是需要教師施教前的充分準備，才能達到預期的成效。

結語

許多台灣的外語教師相信學生只有在學習的初期才需要依賴翻譯，到了大專院校應該直接使用外語來思考學習。但學習者在外語能力有限的情況下，往往必須訴諸於他們的母語來做兩種語言間的意義轉換，只是課堂上學生需要翻譯的學習需求卻常常和教師對於翻譯的負面信念相互抵觸，造成學生不必要的學習焦慮和壓力，但這種抵觸其實在學習理論和教學實務上是可以消解的。

本文特地想要闡釋，從認知主義和社會建構理論觀點來看，學生在外語學習的過程中使用翻譯實是難以避免的心智認知和社會交流活動。另外根據國內外許

多的實證研究報告，在外語教學上使用翻譯是種頗具價值的資源和工具，可以提高教學成效。但要注意的是，在教學上使用翻譯並非是要重返過去文法翻譯法的老路，也不是要鼓勵學生多用翻譯來學習外文，而是特別指出翻譯活動可與目前盛行的溝通式語言教學法結合，增進學生外語的溝通能力。事實上，許多學生未來在職場上很有可能會碰到需要翻譯的情況，例如企業主經常會要求員工從事筆譯或口譯的工作，而且台灣追求國際化的趨勢也需要能在兩種語言出入自如的外語人才。所以外語教師無須完全避免在課堂使用翻譯教學或禁止學生使用翻譯學習，反而應該多加留意學生對於翻譯的策略性使用，並將有助教學的翻譯活動納入教學內容，同時也提醒同學注意使用翻譯的負面效果如母語干擾和字面直譯等，如此一來學生的外語能力不僅能夠提昇，也可得到多元的發展。

參考文獻

- Atkinson, D. (1987). The mother tongue in the classroom: A neglected resource? *ELT Journal*, 41(4), 241-247.
- Baynham, M. (1983). Mother tongue materials and second language literacy. *ELT Journal*, 37(4), 312-318.
- Bloomfield, L. (1961). *Language*. New York,: Holt Rinehard and Winston.
- Carroll, J. B. (1966). The contributions of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educational research to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 In A. Valdman (Ed.), *Trends in language teaching* (pp. 93-106). New York: McGraw-Hill.
- Catford, J. (1965).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An Essay in Applied linguistic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amot, A. U., O'Malley, J. M., & Impink-Hernandez, M. V. (1987). *A study of learning strategies in foreign language instruction: first year report*. Rosslyn, VA: interstate Research Associates.
- Chan, T.-h. L. (2000). *Translation and the foreign language program: Whither are we goi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Nin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nglish Teaching, Taipei, Taiwan, R.O.C.
- Chellappan, K. (1991). The role of translation in learning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3, 61-72.
- Chu, C. (1990). Semantic and discourse in Chinese language instruction. *JCLTA*, 25(3), 15-29.
- Danchev, A. (1983). The controversy over translation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f. l. t. translation, Trans.), *Translation in the system of foreign languages training* (pp. 35-43). Paris: Round Table FIT-UNESCO.
- Gatenby, E. V. (1967). Translation in the classroom. In W. R. Lee (Ed.), *E.L.T.*

- Selections 2* (pp. 65-70).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rtmann, R. R., & Stork, F. C. (1964). The place of grammar and translation in the teaching of modern languages. *The Incorporated Linguist*, 3(3), 73-75.
- Howatt, A. P. R. (1984). *A history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sieh, L.-T. (2000). *The effects of translation on English vocabulary and reading learni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Nin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nglish Teaching, Taipei, Taiwan, ROC.
- Huang, H.-l. (2003). Raising students' awareness of idiomatic English through cross-translation practice.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 28(1), 83-100.
- Huebener, T. (1965). *How to teach foreign languages effectively* (Rev. ed.).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Husain, k. (1994). Translation in the ESL classroom: Emerging trend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1, 115-130.
- Lado, R. (1964). *Language teaching, a scientific approach*. New York: McGraw-Hill.
- Levenston, E. A. (1985). The place of translation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English Teacher's Journal*, 32, 33-43.
- Liao, P.-S. (2002). *Taiwanese students' beliefs about translation and their use of translation as a strategy to learn English*.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Austin.
- Malmkjar, K. (Ed.). (1998). *Translation & language teaching: Language teaching & translation*. Manchester, United Kingdom: St. Jerome Publishing.
- Marti Viano, M.-D., & Orquin, V. (1982). Identifying our students' strategies for learn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Modern English Teacher*, 9(4), 38-41.
- Naiman, N., Frohlich, M., Stern, H. H., & Todesco, A. (1978). *The good language learner*. Toronto: 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
- Newmark, P. (1991). *About translation*. Clevedon, UK: Multilingual Matters.
- Newson, D. (1998). Translation and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n K. Malmkjar (Ed.), *Translation & language teaching: Language teaching & translation* (pp. 63-76). Manchester, United Kingdom: St. Jerome.
- O'Malley, J. M., Chamot, A. U., Stewner-Manzanares, G., Russo, R. P., & Kupper, L. (1985). Learning strategy applications with students of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TESOL Quarterly*, 19, 557-584.
- Perkins, C. (1985). Sensitizing advanced learners to problems of L1- L2 translation. In C. Titford & A. E. Hiehe (Eds.), *Translation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testing* (pp. 51-72). Tubingen: Narr.
- Politzer, R. L. (1983).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Self-Reported Language Learning Behavior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Achievement. *Studies in Second*

- Language Acquisition*, 6(1), 54-68.
- Swan, M. (1985a). A critical look at the Communicative Approach (1). *ELT Journal*, 39(1), 2-12.
- Swan, M. (1985b). A critical look at the Communicative Approach (2). *ELT Journal*, 39(2), 76-87.
- Swan, M., & Walter, C. (1984). *The Cambridge English Cours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itford, C. (1983). Translation for advanced learners. *ELT Journal*, 37(1), 52-57.
- Titford, C. (1985). Translation- a post-communicative activity for advanced learners. In C. Titford & A. E. Hiehe (Eds.), *Translation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testing* (pp. 73-86). Tübingen: Narr.
- Tudor, I. (1987). Using translation in ESP. *ELT Journal*, 41(4), 268-273.
- Vygotsky, L. S. (1978). *Mind in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Zohrevandi, Z. (1992). Translation as a resource: Teach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In R. De Beaugrande & A. Shunnaq & M. H. Heliel (Eds.), *Language, discourse, and translation in the West and Middle East* (pp. 181-187).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 Co.

The Study of Using Translation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Po-Sen Liao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ion an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has long been dynamic, but translation has often played different roles under various language teaching methods. While som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methods consider translation as a critical means to ensure learners' language comprehension and production, other methods may ban or discourage the use of translation in the classroom to avoid interference from students' mother tongue. Although the use of translation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s much questioned by many language teachers, students continue to use it as an inevitable mental process to facilitate language learning. It seems that the function of translation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has not been specified. Furthermore, with the emergence of cognitive-code learning theory and social constructivism in recent decade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publications have reassessed the positive contribution that translation can make to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Therefore, this study is primarily aimed at assessing possible roles of translation,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suggesting that the modern use of translation in the classroom does not mean a comeback of the traditional Grammar-Translation Method, but implies its employment as a technique or an activity. This article also hopes to sensitize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to a variety of perspectives on translation and in turn teachers could actually incorporate translation into their classrooms as a teaching technique in order to enhance learners' foreign language competence.

Keywords: translati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